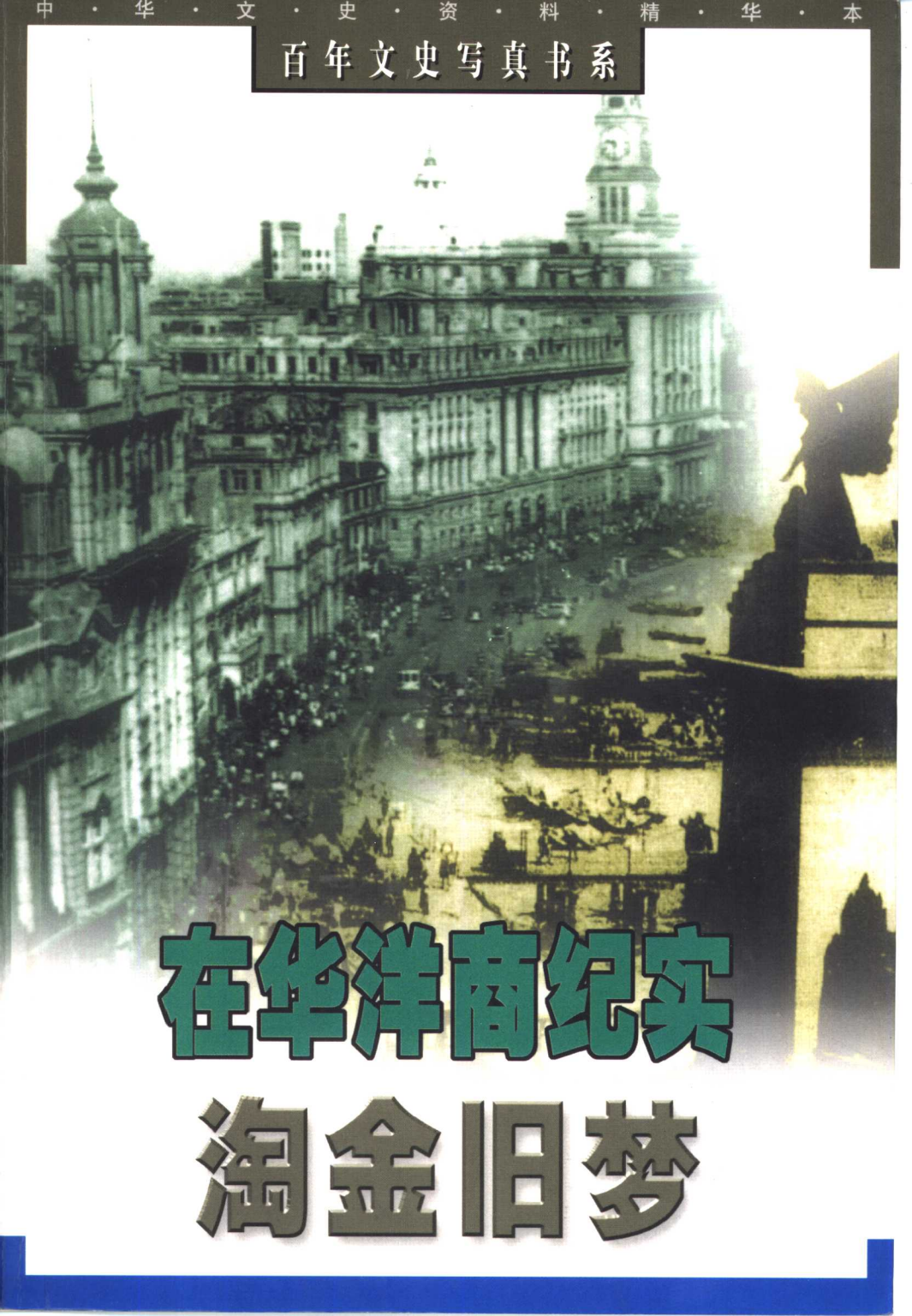


中 · 华 · 文 · 史 · 资 · 料 · 精 · 华 · 本

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在华洋商纪实 淘金旧梦



在华洋商纪实 淘金旧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淘金旧梦：在华洋商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

ISBN 7-5034-1114-7

I. 淘… II. 全… III. 外资公司-商业经营-中国-
近代-史料 IV. F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455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25 字数：266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20世纪去了，21世纪来了。过去的世纪需要回顾，需要温习，新来的世纪应当展望，应当奋进。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温习是为了进一步奋进。为了回顾，回顾上一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沧桑巨变；为了温习，温习上一世纪中国先贤们的奋斗历程，我们选编了这套《百年文史写真书系》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8册。分别是《硝烟弹痕》、《漩涡沉浮》、《机诈权变》、《淘金旧梦》、《文坛档案》、《学林碑影》、《丹青风骨》、《慈父遗爱》。书中的所有文章均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各种专辑史料中选出，这里有军事、政治、经济，有文化、科学、艺术，所有文章都是历史当事者和见证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构成了20世纪活的历史。

编者

2001年1月

4756/08

目 录

1	“洋行之王”——英商怡和洋行	张 锐
28	英商太古洋行在华南的活动	莫应淮
78	美商大来洋行在中国的掠夺	阮渭泾
97	上海法商永兴洋行	陆志濂
107	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	丁福成
129	我在汉口礼和洋行十五年的见闻	张高级
141	我在德商祥臣洋行的见闻	蒋文伟
148	汇丰银行在上海	郭太风
161	蒙自的东方汇理银行	万湘澄

目
录



- 179 中法实业银行的见闻 吕宝德
- 192 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 董明藏
- 201 诈欺取财的万国储蓄会 祝世康
- 213 美商美亚代理保险公司记略
..... 林豹岑 王新厚
- 219 我所知道的美孚公司 范心田
- 243 英美烟草公司史话 陈子谦 平襟亚
- 254 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 王冠东
- 291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概况 江永升 陈鹤皋
- 302 旧上海的大赌窟之一——回力球场 毛啸岑

“洋行之王”——英商怡和洋行

张 锐

所谓洋行之王

在旧中国许许多多的“洋行”中间，英商怡和洋行，由于它的牌子老，规模大，交际广，手段辣，曾经被帝国主义分子尊称为“洋行之王”。它的正式名称是“渣甸、孖地臣有限公司”（Jardine, Matheson & Co., Ltd.），简称“渣甸洋行”（Jardines），“怡和洋行”（EWO）是它的华名行号。

怡和洋行 1832 年创立于广州，1843 年设行于上海。此后它在香港成立了总行，在上海外滩 27 号设置了总管理处。它的分支机构，遍布汕头、厦门、福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昆明、天津、北京、青岛、牛庄、哈尔滨、台北，以及日本的横滨、神户，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各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已经来到了中国，而在甲午战争前后，它就逐步地发展成为一个控制着多种经济部门的大托拉斯。怡和洋行的经营范围极广，不仅有进出口贸易、保险、地产、航运、铁路、码头、仓库，有各式各样自己管理的工业，它还投资于其他企业，又是英商汇丰银行的大股东。怡和洋行是一个典型的专门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的经济机构。它的发生、成长与消亡，完

『洋行之王』

——英商怡和洋行

全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缩影。

同别的老牌洋行一样，怡和是靠鸦片走私起家的。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 1784—1843）与詹姆士·孖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这两个鸦片贩子，就是“洋行之王”的开山老祖。

威廉·渣甸，苏格兰人，原来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随船医生。东印度公司对英国的远东贸易有独占权；破坏这种专利权的，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应处绞刑。但是暴利所在，以身试法者不乏其人。东印度公司对于本公司职员订有特别的优待章程，准许每人每次夹带私货两箱；至于所带何货，则悉听其自便。渣甸不能满足于这种“优待”，甘愿冒被处绞刑的危险，1819年脱离了东印度公司，成为独资的鸦片行商。不久，他结识了詹姆士·孖地臣，两人挂上了钩，他们的毒品买卖就越做越大了。渣甸为人机诈百出，无孔不入，混名“铁头老鼠”，意思是说他既能钻，又能咬。在他的办公室中，从来不为客设座，凡事立谈而决，以免耽误他做强盗买卖的时间。

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于1813年被英国政府取消，但是它的对华贸易专卖权仍得延长20年，即到1834年4月22日（道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才算正式取消。在此以前，渣甸和孖地臣就运用种种方式，破坏中国和英国的法律，进行双重走私。孖地臣曾领得西班牙和丹麦的通商执照，1826年时并曾兼任丹麦驻广州的“公司领事”。渣甸和孖地臣不但在广州一带销售鸦片，他们又雇用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当他们的鹰犬，沿海北上，直至渤海湾，走私贩毒。当时另外一人英籍烟贩印斯（James Innes）曾经这样写过，“我宁愿花1000元，让郭士立也替我干上三天”。

外国侵略者选择鸦片作为轰开中国市场大门的炮弹，是因为鸦片贸易的利润率极高，同时鸦片也适合地主阶级的消费情况。1830年，渣甸由广州致函英国友人，把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当说成是“我所知道的最稳

妥的又最合于绅士风格的投机”。他在信里承认，“在好的年头，我估计每箱鸦片的毛利甚至可以达到1000元之多”。彼时鸦片因产地不同、名称各异，售价亦有差别，总分为“大土”与“小土”。“大土”之中，有“公班”与“刺班”两种。“小土”之中，有“白皮”、“金花”（土耳其产）、“新山”（波斯产）三种。走私烟贩的生财之道，不仅在于贩卖，他们还经常操纵市场，投机倒把，一转手间，即获暴利。例如1828年8月2日，一天的时间，“白皮”的价格，每箱就暴涨了100元。又如1832年，7月份“白皮”每箱市价是465元，到了10月份，就跳到850元。

1832年7月，“渣甸、孖地臣公司”在广州组织成立，从此，怡和洋行在中国就正式开张了。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正式取消。事实上，在此以前，英国对华贸易的大部分已经逐步落在东印度公司以外的私贩手中。例如1825到1826年度，英国输华的商品总值为2120万英镑，其中由私贩经营者占1570万英镑。同年度英国由华掠夺出去的商品总值为2100万英镑，其中私贩占1260万英镑。在英国对华片走私的烟贩中，怡和洋行是首屈一指的。1834年，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正式取消后的三个月内，怡和洋行运到广州的货物有75船之多，它的贸易数量足有当时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煽动战争，从中渔利

尽管怡和洋行的强盗买卖越做越大，渣甸和孖地臣等外国侵略分子还是一直不满足于当时中英贸易的状况。在大规模进行鸦片走私的同时，他们就酝酿着发动一次战争，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1830年，在华的英商47人，曾联名向英国议会致送呈文，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并建议派兵船占领沿海的岛屿，以利英国对华的贸易。这一篇呈文就是由孖地臣亲手起草的。渣甸总是盼望英国政府能够早日

对华采取武力胁迫的政策。1831年英国派舰队由印度来华“访问”，这件事就触动了他的杀机。当时他写信给友人说：“我不知道舰队司令可以从什么地方得到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的指示，除非他能挑起中国战艇向他开火，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言外之意，深恨不能逞其凶愿。

英国外交部，在接管了东印度公司对华的贸易事务以后，派遣贵族院议员、海军高级官员律劳卑（W. J. Napier）来中国担任英国驻华第一任商务监督。1834年，律劳卑到达广州，寄寓在渣甸的家中，他们的关系至为密切。在渣甸的倡议与律劳卑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广州的英国商会，孖地臣当选为商会的第一任主席。孖地臣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名曰《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律劳卑对华的恫吓办法没有生效，相反地，两广总督卢坤下令“封舱”，以停止中英贸易的办法来作抵制。律劳卑不得已由广州退回澳门，旋即病死。律劳卑死后，孖地臣借伴送律妻返英之便，向英国各地的工商业资本家进行游说。1836年，孖地臣在伦敦出版了《对华贸易的现状与展望》一书，竭力鼓吹英国对华应当采取“前进政策”。在他的鼓动之下，曼彻斯特、利物浦、葛拉斯哥几个大城市的商会都先后向英国外交部迭送说帖，要求“加强对华贸易的保护”。英国在华的鸦片贩子和本国的工商业资本家，他们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

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局面。19世纪20年代初，库平纹银每两折合制钱1000文上下，1832年涨到1350文，1838年更涨到1600多文。这种情况既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威胁着封建统治的稳固。清政府中，抵抗派的势力抬头，封建王朝再一次严行禁烟。怡和洋行等大烟贩就以武装走私相对抗。1838年，广州处决为虎作伥的华籍烟商，英美烟贩居然敢捣乱刑场，抢走绞架。广州人民为了抗议这一暴行，举行了将近1万人的大示威。

1838年12月，清王朝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

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是坚决主张禁烟的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他原任湖广总督时，短期内在武昌、汉阳查获烟土 12000 两，在湖北、湖南两省缴获烟枪 5500 多枝，声势赫然。他要来广州的消息使外国烟贩感到张皇失措。渣甸劣迹昭彰，臭名远扬；1837 年时，许球在奏折中已检举了他的罪行，道光根据这个奏折，曾着粤督邓廷桢查办。林则徐尤深恶其人，说“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为祸首”。渣甸预知大事不妙，他一面通知怡和洋行驻孟买的代理人暂时停止进货，一面趁林则徐未到以前仓皇逃走。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派兵监守洋馆，断绝趸船与洋馆间的来往，并谕令将停泊在伶仃洋面的鸦片烟船上的烟土限期呈交。当时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C. Elliot），在无仗可施的情况下，命令英商交烟，保证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全部烟价。义律想借此引起直接冲突，以便于发动战争。孖地臣积极支持义律，立即通知溜回伦敦的渣甸说，“这是一项远大的和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措施，特别是由于中国人业已掉进了要向王家政府直接负责的圈套”。林则徐缴获的鸦片两万多箱，其中怡和洋行交出了 7000 箱，所占的比重最大。即此也可以说明怡和洋行确实是当时最大的烟贩。与渣甸和孖地臣齐名的另一英籍烟贩颠地（Dent，华名宝顺洋行），只交出了 1700 箱。

鸦片尚未全数交齐以前，在洋馆中扣留了 16 名外国烟贩，其中便有孖地臣在内。他们具结不再贩烟，被开释后，孖地臣马上写信给渣甸：“我们今后仍将按着你的老规矩办事。”这就是说，要继续进行武装走私和混水摸鱼。广州缴烟的事件对于印度的鸦片市场发生了影响。“白皮”的价格突然跌到每箱 200 元。据当时怡和洋行账册的记载，怡和洋行一手在广州缴烟，一手又以低价在印度补进，后来这一批烟土陆续运来中国以 800 元一箱的高价售出。1839 年 5 月，孖地臣被林则徐驱逐出境，他搬上了大号的烟船，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亲自指挥沿海的武装走

私活动。有一艘怡和洋行的走私烟船，在南澳附近抗拒中国船艇的搜查，进行了四小时的白刃战，走私船终被焚毁。孖地臣还派人去马尼拉，设法把运销马尼拉的烟土转口来华。他又勾结其他国家的商贩，代怡和洋行在广州做非法的交易。怡和洋行的商船，改挂了丹麦、瑞典或普鲁士的国旗，依然进出黄埔。美籍商人李安（James Ryan）和柯立治（Joseph Coolidge），原是美商旗昌洋行的职员，旋被怡和洋行所雇用，在广州代为经营印度棉花进口与中国茶叶、生丝出口的业务，并经常向孖地臣通风报信。

渣甸逃回英国后，从各方面进行对华作战的煽动。1839年，通过他在伦敦的密友和代理人阿贝·史密司（Abel Smith）的关系，渣甸谒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①，力陈要对中国用兵，并根据他窃取去的地图和其他情报资料提出具体的作战方案。他又主张在战后应提出五口通商和赔偿烟价等要求。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张皇失措，将林则徐撤职严加议处，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去广东办理投降交涉。1841年1月，琦善与义律签订了中英穿鼻草约。这项草约为帕麦斯顿等所极端不满，决定推翻，解除义律在华的一切职务，改派以侵略印度有功为统治阶级所赏识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为侵华全权代表。这个以扩大战争来谋取更大的侵略利益的决定是完全符合于渣甸等人的愿望的。当时渣甸已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在璞鼎查启程来华以前，渣甸便和他密谈过三次，写信告诉孖地臣说，“谈得非常满意”。当清政府向英国侵略者投降的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8月）签订之后，帕麦斯顿致函阿贝·史密司说，“主要是由于你和渣甸先生出色地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在华的海、陆军与外交事务上，发出那些

^① 帕麦斯顿（John H. Temple, Viscount of Palmerston, 1784—1865），19世纪英国主要当权者之一、两次鸦片战争的发动者。马克思曾分析过他的政治活动、无赖性格和他所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

详尽的指示，从而获得这样满意的结果。”这就是帕麦斯顿对于怡和洋行早期侵华罪行的亲笔供词。

封建王朝向外国侵略者卖国投降，而中国人民却是坚强不屈的。这一期间，在广州有三元里平英团和升平学社的斗争，在福建有反英军攻占厦门的斗争，在浙江有反对英人在定海暴行的斗争，在江苏有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等等。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同年12月，广州的民众攻烧了洋馆，怡和洋行在广州的行址被焚毁。孖地臣嚎啕说，“一个最可怕的暴动，在广州爆发了”。

强盗买卖的日益扩张

1841年，英国侵略军强占香港之后，怡和洋行立即在香港建筑了一座石头仓库，并将鸦片走私的指挥部迁移到那里。当时有若干英商人认为香港是一个荒岛，开发匪易，但是怡和洋行却主张长期盘踞。孖地臣致函渣甸说：“有人比较喜欢九龙，但是我看香港、九龙可以兼而有之。”还在南京条约正式签订以前，怡和洋行只花了565英镑，在香港强购了沿海地皮57150英尺。这些土地后来成为香港地价最高昂的地区，是怡和洋行在香港进行土地投机和资本积累的有力工具。仅仅凭借565英镑的原始投资的一部分，怡和洋行后来开办了一个“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公开资本是港币1000万元。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由于上海在地理位置上的一些特点适应于外国侵略者的需要，他们选择了上海作为侵略中国的主要据点。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又取得了长江航运权，从此以后，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便取代广州的地位而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怡和洋行的发展是与这样一个总的形势相适应的。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通商，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

Balfour) 积极展开了勒索土地以备建立租界的活动。当时在上海的英籍侨民不过 25 人。一个月内, 有七艘英国船赶运烟土来沪, 其中以怡和洋行的一艘为最大, 载重 423 吨。1843 年, 上海怡和洋行正式成立。1845 年《上海土地章程》公布后, 怡和洋行捷足先登, 取得了上海英租界天字第一号的土地登记证。这一块地皮, 便是解放以前上海外滩 27 号的怡和洋行总管理处所在的地方。在 100 年中, 这是怡和洋行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活动的主要基地和指挥所。上海英租界的初期, 沿着外滩的好土地多为英、美的大鸦片商所占据。当时主要建筑物的顺序, 由苏州河迤南, 是这样排列的: 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仁记洋行、宝顺洋行、海关、美商旗昌洋行。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怡和洋行的强盗买卖, 便紧紧地伴随着英国对华侵略势力的扩展而壮大起来。1859 年, 日本横滨根据《安政条约》正式开放, 怡和洋行又向日本开出了它的第一艘商船, 紧接着在横滨的山手区建立了办事处。山手区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英、美商业在横滨的中心地带。

怡和洋行早期的扩展, 具体地说明了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特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 是和它本身的发展相适应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资本主义列强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强迫清封建王朝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彼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发展转化, 经济侵略还是以商品输出为其主要形态。它们的主要企图, 是逐步开辟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它们在中国攫取便于进行掠夺性贸易的种种特权, 强占便于进行侵略的根据地。它们又在中国发展航运, 图谋修筑铁路, 开辟矿山, 勾结中国封建势力, 培植中国的买办阶级。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便利和扩大经济侵略, 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在这些方面, 怡和洋行都有既凶狠而又狡诈的表演, 可以摘要加以叙说。

开展航运、强筑铁路、掠夺矿山

鸦片战争以前，私运鸦片到广州的外国烟船，停泊在伶仃洋面，然后以混名叫“快蟹”和“扒龙”的帆船向黄埔进行偷运。对于这种帆船，道光十一年御史冯赞勋严禁鸦片烟的奏折中，有这样的描绘：“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板，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敌对。”

从印度贩运鸦片来华，由于印度洋上有季节风，需要特别的快船，名为“飞剪”。当时的“飞剪”中，以怡和洋行的“西夫”、“红盗”、“雄鹰”以及宝顺洋行的“水妖”等号为最有名。由于怡和洋行沿海向北走私，它经常每季赶运三批烟土来到伶仃洋面，它的“飞剪”船保持过由印度到中国 17 天半的高速记录。1835 年，怡和洋行又从英国搞来一艘名叫“嘉定”号的轮船，企图代替帆船从伶仃洋面向广州输送鸦片。这条船长 85 英尺，宽 17 英尺，据说是驶入广州港口的第一条轮船。由于人民群众的反对，清政府加以制止，怡和洋行不得不将它送回新加坡。

怡和洋行的航运事业，在加强鸦片走私的基础上逐步地扩大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怡和洋行有一只 700 吨的趸船长期停在香港，另有趸船七艘散布在中国沿海，此外还有九只“飞剪”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不仅扩大了中国沿海的航行范围，又攫得了沿江的航行权。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若干大的外国轮船公司，便陆续在上海组织起来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861 年）、英商会德丰和上海拖驳公司（1863 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1867 年）相继成立。怡和洋行于 1875 年在香港建立了怡和轮船公司，1877 年在上海设置分公司，1882 年开始了长江的航运。在抗日战争以前，日清、怡

和、太古、招商局是经营长江航运的四大公司，而在货物的载运量上，三家外商轮船公司占有显著的优势。例如 1927 年时，长江航运载货量的百分比是：日清 38.1%，怡和 26.4%，太古 20.4%，招商 2.1%，其他（包括华商三北、宁绍，美商捷江、法商聚福等公司）13%。抗日战争结束后，怡和洋行急于恢复和发展它的航运事业，它与川帮聚兴诚银行以及另一华商孙益祥伙办了一个安和公司，行驶汉口、长沙一线。这个公司的轮船安和号，便是由怡和洋行提供的，解放后售与民生公司。在旧中国的沿海航运方面，怡和洋行有相当大的实力。在日本投降后，它还与另一英商可孟兄弟公司（Commons Brothers）伙办了澳华轮船公司，经营澳洲、香港、上海间的海运业务。

怡和洋行经营了许多与航运有关的企业，例如码头、仓库、船坞和保险事业等。1875 年，怡和洋行在上海吞并了几个码头公司，建立了规模极大的公和祥码头，组织了上海虹口码头公司，由怡和洋行担任总经理。1883 年，它吞并了老宁波码头，1890 年又吞并了浦东码头。这几个码头，都是上海码头的精华所在。解放前夕，怡和洋行在上海方面占有价值最高的码头 3000 英尺，浦东方面 2550 英尺，同时可供十只大海轮停泊之用。它在上海拥有的仓库，遍布市区各地，面积共达 2505000 立方英尺之多。它又是上海英联船坞的最大股东。

广州的柯拜船坞，原为苏格兰人约翰·柯拜（John Cooper）所创办，专门为烟船服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船坞被广州群众所捣毁，柯拜被俘后不知所终，战后由柯拜的儿子加以重建。1863 年，怡和洋行收买了黄埔的柯拜船坞和香港的阿伯丁船坞，组织成立了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业务范围极广，不仅限于修船、造船，并兼营机械、锅炉和铁路器材的制造。

怡和洋行控制下的天星轮渡公司，垄断着香港与九龙间的交通，这个轮渡如果有一天不开动，对两地居民间的生活便会发生莫大的影响。

怡和洋行在香港、九龙拥有的码头，可以停靠吃水 32 英尺的海轮十余艘。它在九龙方面的仓库，高达六层，备有多种升降机和起重机，存储量可达 75 万吨，其中还有一个特别建造的保险库房，以备存储 500 吨金条、银块或其他贵重物资之用。

外国侵略者把铁路当作是进一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控制中国的铁路交通。中国之有铁路，开始于 1876 年上海的吴淞铁路，这条铁路是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外商集团搞起来的。在强筑吴淞铁路以前，怡和洋行已在积极进行掠夺中国路权的活动。

远在 1863 年，怡和洋行便在上海纠集了 27 家外国商人，联名向江苏巡抚李鸿章提出由上海到苏州修筑铁路的计划，遭到拒绝。1864 年，怡和洋行从印度聘请英籍工程师麦克唐纳·史蒂文生（MacDonald Stephenson）来华，又向清地方政府提出一个更大的修筑铁路方案，建议修筑由汉口到上海，由上海到北京，由汉口到广州和由汉口经四川、云南通印度的四大干线；另外修筑由上海到宁波，由苏州到福州的两条辅助支线。这个方案当然也没有得到实现。但是，“铁头老鼠”的后裔是不甘心于失败的，怡和洋行终于在上海搞了一出强筑吴淞铁路的鬼把戏。吴淞铁路的全长只有 15 公里，路线很短，但这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铁路权利的第一次掠夺。正如英帝国主义分子肯德（P. H. B. Kent）在其所著《中国铁路发展史》中所招认，“这是为了对中国人提供一种示范，使他们在心理上习惯于这种新的观念，为将来的发展铺平道路”。

1865 年，怡和洋行组织了一批在上海的外商，其中有美商旗昌洋行（大鸦片贩子）在内，成立了一个铁路公司，企图修筑由上海到吴淞的铁路。1866 年 3 月间，由英国公使阿理国向北京总理衙门提出了请求，遭到拒绝。怡和洋行看到明干不成，又想出一条暗渡陈仓的诡计。它用便利各国在上海侵略军队军事运输的名义，在上海领事团的同意下，“效劳修筑”由上海到吴淞的马路。1837 年租购了必要的土地，在上面